

◀（上接 10 版）

证。”她说。

问题二：用文物图片为主角表现历史,有哪些难点？

答:《图谱》序言写道:“(该书的编写)打破传统历史学与考古学等学科研究之间的学科壁垒。”栾成显认为,历史以文物解读,文物同历史展现,正是《图谱》的编纂特色。编写者们采用文物与历史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式,综合运用考古学、文博学、历史学、文献学等多学科知识,做到用文物图片为主角来表现历史。

当然,这样的编写方式也带来了不小的挑战。“从专业角度说,最主要的难点在于作者必须具备历史和考古两方面知识,并系统掌握所涉断代的全部历史资料和文物资料。”黄正建解释道,如果作者没有对本断代历史的全面熟悉,就不能判断哪些历史问题需要用文物展示、说明;如果没有对本断代文物的全面熟悉,就不能判断哪些历史问题没有相应文物因而无法展示和说明。这种专业要求迫使作者在掌握本断代各种事件、各项制度、各类文化风俗的历史知识之外,必须对已出土或传世的文物有全盘了解,才能从中挑选出最能说明历史现象或历史问题的文物来。为做好这项工作,各卷作者必须将几十年(乃至上百年)来所有已经公开的考古文物资料全部翻检一遍,以自身的历史知识予以鉴别,挑选出最能反映本断代历史的数百张图片。“这一过程显然不是东拼西凑就能完成,需要做艰苦细致的工作,需要耗费大量精力和时间。”

此外,栾成显提到,一旦资料准备的过程被打断,或搜集的资料被打散,或原有的作者被替换,工作就要从头开始。加之上世纪末开始,新出文物层出不穷,更增加了搜集资料的难度。他认为,这也从一方面解释了《图谱》为什么需要长达 60 年的磨砺,除了政治运动、人员更替、图片版权等问题外,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编写本身难度高,“纯文字怎么都不会编这么久”。

在不少编写者看来,完全用文物图片展现历史是一种理想状态。正如《图谱》主编张政烺先生所言,文物不可能全面反映历史。

项目发起人王曾瑜坦言:“不可能每个重要史实都能找到相应的、合适的图片表现。”即使编写者具备全局性眼光,挑选文物图片仍有其局限性。比如,一些朝代因为距今时代



图 1



图 3



图 5

近,文献多文物多,而先秦部分尤其原始社会部分的“物证”收集就相对困难。罗琨说,随着近年考古发现和研究的进展,提供不少新知,原本她想将“人与自然”作为一个章节编写,但因为受到公开发表的资料的限制,图片不够,最后只能做成一个小节。

罗琨感到,有时候用考古资料与文献史料“直接对应比较难”。比如《原始社会卷》介绍人与自然的关系中,包括的应对措施——治水,选用了“四千年前大型盟会的礼仪性建筑”,即安徽蚌埠禹会村“祭祀台基与涂山的相对位置”等图版。罗琨告诉记者,在禹会村地区民间长期流传“禹娶涂山”、“禹会诸侯”的故事,相关考古发现证明这里是一个大型集会的活动场地遗存,很可能与治水有关,在淮河地区确曾有联合抗洪的活动。但是要证明禹会村遗址就是建立夏王朝的夏

后氏自出之祖——大禹的盟会遗存,还有待文献学理清夏人先世的源流及活动地域、考古学从文化源流等方面提供更多的实证,再进行整合研究。

《夏商西周卷》作者任会斌表示,除了时代所限,不同种类文物的表现能力亦有难易之分。比如,官制等很难通过图片展示,而手工业成果则易于展示。

问题三:《图谱》是由 17 位作者共同编写的集体项目,编写者从成千上万张图中最终遴选出约 400 张图片编入一册书。那么,在选图方面有哪些统一标准?

答:黄正建表示,虽然作者在选择图时不可避免地存在主观性,但有一些基本原则是必须遵守的——“历史价值第一,艺术价值第二”,这也是早期张政烺先生为《图谱》选图定下的基调。换言之,图片只要能反映重



图 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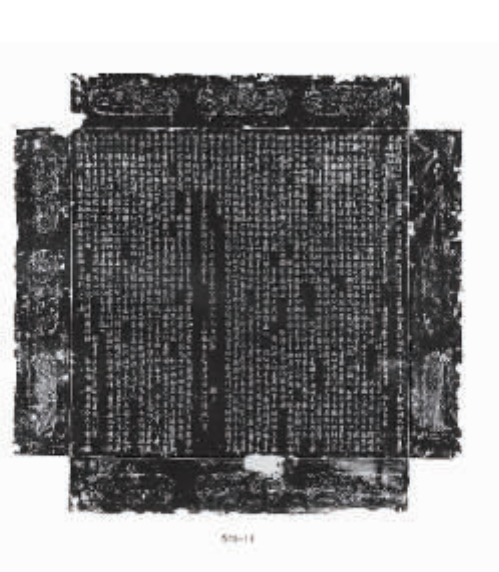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4

《图谱》编写的基本原则是“历史价值第一,艺术价值第二”,故而作者选图时会有舍弃光彩文物的情况,在各卷册中还使用了大量墓志等不够“好看”的图片,以及选择文物未改变原状时的早期拍摄的图片。

要史实,可以不求其美观性。

在《图谱》各卷册中,有不少这样的案例。比如在罗琨编写的《原始社会卷》中,在展现藤花落龙山文化古城址(位于今江苏连云港)时,着重介绍内城南城门右侧作干栏式建筑的哨所,她还选用了哨所基址发现的石杵臼和残石鏃,以展示历史的沧桑,同时配上该遗址同型的完整石鏃(见图 1),使读者对当时石鏃形制及武器发展程度有明确、直观的认识。

比如《秦汉卷(上)》中,在表现西汉后期的饮食生活史时,作者赵凯选了一张有残缺的碗图(见图 2)。他介绍,这个碗是在被黄河冲垮的河南省内黄县三杨庄聚落遗址中出土的,很可能村民本来在吃饭,看到洪水来了赶紧丢下碗跑了。他说,虽然在同一时期墓葬中出土了不少更精美的碗,但他依然选择了这只做工粗糙的灰陶残碗,“因为真实生活中使用

的碗比明器生动”。

比如在《隋唐五代卷(下)》中,作者黄正建选择了一张残缺的长沙窑釉下彩瓷器图(见图 3)。长沙窑是唐代中晚期重要的外销瓷器窑,他选择这张残品图的一大原因就是它的表面写有诗文:万里人南去,三秋雁北飞。不知何岁月,得共汝同归。这是当时长沙窑的特点。通过这件瓷器,他希望读者能领略到唐诗文化在当时之发达。

除了对光彩文物的舍弃,在《图谱》各卷册中还使用了大量以往不太入选“图说类”著作的不够“好看”的图片,比如简牍文书、墓志墓穴等(见图 4)。黄正建认为,《图谱》的这一做法扩充了有关“历史图谱”的范畴,具有创新和典范意义。

另外,有些图片虽然有近照,但书中仍选用了老照片。黄正建说,这主要是因为有些文物随着时代的变迁改了模样,在这种情况下,作者一般选择早期拍摄的图片。比如,《隋唐五代卷(上)》中,有一幅山西蒲津渡出土的唐开元铁牛、铁人图,使用的就是 1989 年这些文物出土后不久拍摄的图片(见图 5)。原来,这些文物出土时锈迹斑斑,为了美观,人们将其涂成黑色,改变了原貌。

所谓选图“历史价值第一”,除了图片本身要能展现史实,另外还有一层含义:图片要有稀缺性,或者较为罕见。

有些图片在历史上有多个版本,在各个历史时期也产生了各种影响,这时该选哪张图呢?王曾瑜说,例如孔子像等,不可能有肖像画传世,只能从文物中找尽可能早的画像石之类。

在《图谱》中,还有一部分是以往很少看到的图片。比如,在《元代卷》中有 21 页是帝后像,其中后有 9 页。尽管在初稿送审时,有常务编委提出“不知道这些皇后在历史上起了多大作用”,但在另一些编委和出版社编辑看来,这些皇后图之前在大陆很少有过发表,值得入选。

问题四:《图谱》从 1958 年立项到 2007 年第一版问世,过去近 60 年。本次出版的《图谱》主要由 2004 年“上马”后重组的编写班子完成,与主编张政烺先生之前拟定的编写计划相比,内容上有哪些突破?

答:多数编写者认为,《图谱》大体上是按张先生的规范、框架、思想编写的。对比此次《图谱》最后一卷,即由张政烺先生编写的《中国历史图谱资料目录(封建社会部分)》来

(下转 12 版) ▶